

北京： 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1400—1900)

下册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美] 韩书瑞 (Susan Naquin) / 著

孔祥文 / 译

孙 昉 / 审校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北京：
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1400—1900)
下册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美] 韩书瑞 (Susan Naquin) / 著
孔祥文 / 译
孙 昉 / 审校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 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1400—1900)/(美) 韩书瑞著；孔祥文译；孙昉审校。—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ISBN 978-7-300-23827-2

I. ①北… II. ①韩… ②孔… III. ①城市史-研究-北京-1400-1900
IV. ①K2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04201 号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北京：公共空间和城市生活 (1400—1900)

[美] 韩书瑞 (Susan Naquin) 著

孔祥文 译

孙 昉 审校

Beijing: Gonggong Kongjian he Chengshi Shenghuo (1400—1900)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 (总编室)	010-62511770 (质管部)	
	010-82501766 (邮购部)	010-62514148 (门市部)	
	010-62515195 (发行公司)	010-62515275 (盗版举报)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 (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148 mm×210 mm 32 开本	版 次	2019 年 3 月第 1 版
印 张	34.625 插页 4	印 次	2019 年 6 月第 2 次印刷
字 数	945 000	定 价	149.00 元 (全二册)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出版委员会

主任：戴逸

执行主任：马大正 崔建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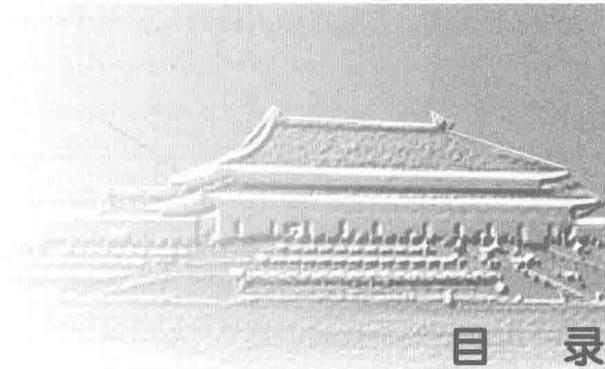
委员：卜键 朱诚如 成崇德
郭成康 潘振平 徐兆仁
邹爱莲

学术秘书：赫晓琳 李岚

Peking:
Temples and City Life,
1400–1900

Susan Naqui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es Londo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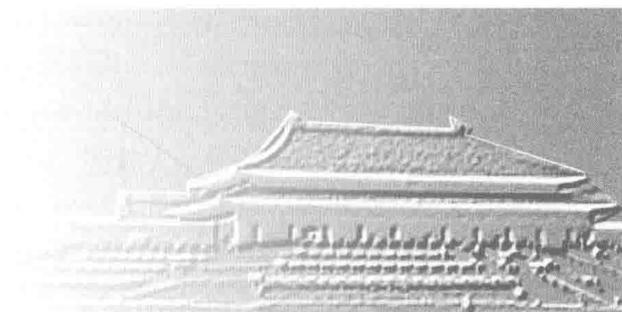


下 册

第十三章 清代北京的名胜	515
方志和汇编	516
私人著作和指南手册	526
来自使团	536
对于游客们	560
第十四章 宗教团体	574
为人熟知的神灵	575
东岳庙	582
朝圣和泰山娘娘	595
妙峰山	607
其他圣会	628
政府的影响	637



第十五章 寺院与私人目的	649
家族	650
穆斯林	656
基督徒	662
藏传佛教徒	673
教门	681
会馆	689
行会、会馆和寺院	705
第十六章 寺院和公共目的	717
市场	718
娱乐	729
政府服务	737
私人慈善事业	750
政治	774
结语 寻找老北京	783
1900年及其众多后果	783
古老的首都	792
北京的独特性?	812
附录一 寺院数目	819
附录二 碑文资料	821
附录三 明清寺院的捐助	822
参考文献	846
索引	979



图表目录

下 册

表

表 15-1	北京会馆的省籍	697
表 16-1	19 世纪北京重要神诞日庆典	724

地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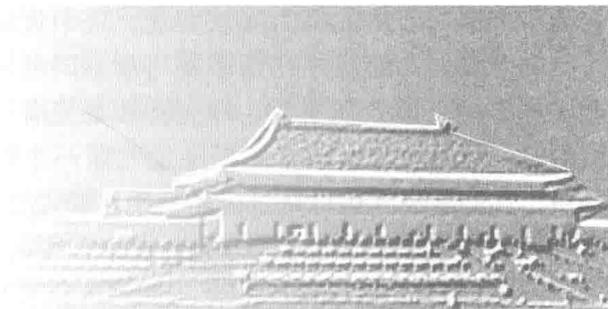
地图 14-1	泰山娘娘庙	597
地图 15-1	基督教、藏传佛教和伊斯兰教的中心	663

图

图 13-1	前门外西边	525
图 13-2	京城全图	534
图 13-3	钟鼓楼	556
图 14-1	中顶庙石碑	601
图 14-2	丫髻进香	602
图 14-3	朝圣圣会告示	617
图 15-1	西山大觉寺平面图	652
图 15-2	黄寺的汉白玉佛塔	677



图 15-3	前门外东边	704
图 15-4	仙城会馆的布局	709
图 16-1	从新年庙会回家	725
图 16-2	1890 年小南顶的水灾救济	743
图 16-3	1897 年的北京消防员	757
图 17-1	天坛的祈年殿	802



第十三章

清代北京的名胜

明末精英们创作的有关北京的丰富旅游文献，成为理解清代这座城市的⁴⁵¹基础。经过新王朝一段时间的调整，一个“北京”开始从当地人与外地人留下的轨道和痕迹模式中显现出来。外来人与当地人相互作用所产生的旅游景点成为这个城市变化中的文化轮廓的一部分。正如我们将在这本书结尾所要看到的那样，最著名的一些景点提供了从明代通往清代、从清代通往现代中国的一座桥梁。

本章从17世纪末有关北京的互相矛盾的著作着手，进而依次研究皇家在定义和记载京城名胜的积极作为、寄居者和当地人私下传播的观点、与消费者和旅游者有关的地图和指南手册在19世纪的发展。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那样，作为政治和文化中心的北京地位与其在明代相比，受到来自长江中下游城市的挑战是极其微弱的。直到中国受到西方文化的冲击时，清末商业中心和通商口岸才有可能产生更强有力的竞争。

1644年后，为把北京重建为旅游者关注的目的地花去了一些时间。首先，清代的敏感和明代的痛苦记忆使得把这两个时期结



合为一个单一历史的努力无法实现。一个世纪后，北京找到了一个新的平衡，人们这才开始喜欢与众不同的清代名胜。欧洲耶稣会士和传教士被大批士兵、外交官和观光者所代替。外国的、中国的和当地的景色被赋予晚期皇家北京一个活跃和维持多样性的身份。这些表现（而且是错误的表现）转变成我们所知道的北京，或者我们所想到的老北京和今天的北京。

方志和汇编

452 在最初的几十年中，记载北京的那些人受到压制，而且变得不确定：他们是如何表现旗人和新政权制度特征的呢？最初，只有极少数著作得以刊行，甚至在接下来的一个世纪，京城被赋予的文学形象及其重要性几乎完全置于历史研究和大量汇编的安全范围之内。

大兴籍人孙承泽在过去中寻求慰藉。身为1631年进士的孙承泽在1644年严重误判形势，曾短时期效力于起义者李自成，但是他在清朝很快又官复原职。在17世纪50年代，孙承泽研究并刊行了那些生活在明代最后四个时期的著名北京当地人的传记。^①同时，他还撰写了一部篇幅更长的有关明代北京的书籍。这部《春明梦余录》包括了更广阔的顺天府地区，但主要内容还是集中于京城。在有关消失京城类型的写作中，孙承泽创作了一份有关明代宫廷建筑、皇家祭坛和政府衙门详细历史资料汇编——所有明代以前宫殿的起源。两卷论述了“名迹”，并且按照它们的（一个重点在于）古迹列出其他55座寺院。这份资料汇编在私下流传，在孙承泽的有生之年没有刊行——事实上，直到1761年才得以刊行。^②

① 孙承泽（1592—1676）：《畿辅人物志》；《顺天府志》，1885年，卷105，5096～5097页；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669～670页。虽然名词“畿辅”在明代就已经被用来指更大的北京地区，但是孙的著作首次在标题中使用它（据我所知）。

② 孙把他的著作编成了两个版本，长卷，为早期的《春明梦余录》（70卷）；短卷，即后来的《天府广记》（44卷）。后者以手抄本形式流传，谈迁：《北游录》，55页；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670页。其中没有包括地图或视觉资料。

江苏学者顾炎武在17世纪60年代到北京周边地区进行调查并且记载了有关历史遗址，但他的著作在刊行时也出现了波折。其简本《京东考古录》，对明代帝国的官方县志进行了细致的校正，直到1702年才开始刊印。他的长篇散文《昌平山水记》，甚至详细研究了更敏感的明代皇陵，直到1906年才得以刊行。^③

除了令人失望的相关北京私家历史外，清朝国家精明地试图通过他们自己的撰写来抢占先机。一本《畿辅通志》的康熙朝版本在新近任命的（汉人）总督指导下于17世纪70年代开始编纂，于1682—1683年出版。这是一部参考书，在4册46卷中，其基调是历史的、专业的并且似乎是中立的。在文字和地图上，北京是作为顺天府的中心而得到塑造的。^④ 453

为了充实官方的记载，编纂了有关北京两个县的当地历史，于1682—1685年刊行：《宛平县志》和《大兴县志》。编纂是在府尹的监督下进行的，这两部著作遵循着标准县志的样式并包括了某些相同的资料。从表面来看，由于对现在感到不适，他们删去了最近的变化，极少引用来自清代的资料，完全集中于明代时期。八旗的北京被全部忽略，皇城几乎没有被显示出来或被提及。城市的北京被分解为两个大县。简略、朴素且粗糙的制作，这就是首次且唯一关于北京及其所属县的方志。然而，退而求其次，它们对于游人来说可能仍然是有用的：当金昌业于1713年作为朝鲜使团的一员到达北京时，他购买了一本《大兴县志》的抄本，而且当他在北京周边进行私人旅行时，经常参照它。^⑤

同时，当没有效忠明代的新一代汉人学者开始在京城官僚机

③ 顾炎武的许多著作在《四库全书》中被禁，并且在北京他的两本著作一起消失了。顾炎武：《昌平山水记》，《京东考古录》；《昌平山水记》得到《四库全书》的注意但没有收录进去。《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76，4页。有关北京的古迹和万岁山（又称景山）消失的文章，《顺天府志》，1885年，卷122，6369~6370页。

④ 《畿辅通志》，1683年。

⑤ 我已经看到1684年和1685年的版本，是各种各样手写、印刷及二者的混合。也有一本1685年流产的府志，《中国地方志联合目录》，1页。金昌业：《稼斋燕行录》，149页及各处。



构任高职时，有关京城的不同种类著作的出版成为可能。面向清代北京缓慢转变的第一个阶段可以在高士奇的著作中看到，他是康熙皇帝的知己，又是 1684 年关于皇城的两卷本《金鳌退食笔记》的作者。高士奇利用接近档案与老太监们的条件，描述了汉人可能从未见过的地方的过去和现在。他对明代事件的公平对待和对清代珍闻的知悉，设定了一个更适宜于新时期的真实声调。他的地位使得这部书的刊行更加容易。^⑥

454 有一部更全面、更严谨的关于北京的著作，与县志相比，似乎显得特别单薄，这部书是由朱彝尊（1629—1709）著，他是另一位来自浙江并有特权接近康熙皇帝宫廷的学者。朱彝尊于 1688 年完成了《日下旧闻》，并且把京城的历史建在牢固的史学基础之上，同时仍然间接地展现了都城过去的风格。^⑦“日下”这个标题反映了朱彝尊对北京的表达不只是作为一座城市自身的权力或作为县府所在地，而且还作为皇帝的住所。这样，北京清代的存在就是通过一系列汉人朝代和非汉人朝代都城——明、元、金和辽的建立而被容纳进来。

朱彝尊的重点放在明代的北京。他集中于北城，系统地描述了重要的建筑物，并且附有相关的人物和事件的引文。凭借广泛的阅读（这本书告诉我们有 1 600 个出处！其中包括了大部分在第八章中所讨论过的明代有关北京的书籍）。朱彝尊多次参观现场，访问年长的居民。朱彝尊所采用的史料优先于诗歌。显然他的目标是积累关于昔日习俗的记载，而不是摘录它们，或者保持它们的一致，或者是它们与当代活动的关系。

虽然朱彝尊对他所熟悉的宫殿给予了大量的关注，然而

⑥ 高士奇：《金鳌退食笔记》。“金鳌”一词指的是金鳌玉蝾桥，横跨并且划分皇城北边和中央湖泊。高士奇有用的研究出现在他的文集中和不同的 18 世纪汇编中，包括《四库全书》。《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卷 70，4 页。

⑦ 朱彝尊的 42 卷之外又有 7 卷增补，多数由其儿子编写；最后的版本在十年后完成并刊行。参见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182~185 页；瞿宜颖：《北平史表长编》，225 页。该书前言中提到了有关洛阳、开封和杭州的著作，朱彝尊视这些著作为先例。

对于这位作者和他假定的读者而言，寺院是首先感兴趣的公共建筑。^⑧ 通过这些寺院的地址，可以辨识出古老城市的痕迹；寺院的石碑碑文记载了北京的历史。这本书列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 429 座寺院（据我统计），超过 1635 年《帝京景物略》的三倍。^⑨ 作为有价值的地点，郊区寺院的重要性通过相对大规模处理得到间接强调（占 42%）。与高士奇不同，更类似于方志，朱彝尊把清代首都完全排除在外。他按照明代城市的五城结构并且根据明代的资料描述了岁时节日。这样由他所表现的北京是不属于现在但属于过去的城市。

当然，分成 20 分册，用 2 个匣子包装的朱彝尊这部著作是不便携带的，而且没有地图，与其说是写给旅游者看，不如说是写给研究过去的严肃学者看。^⑩ 它的 8 篇前言（其一是他的高姓朋友的）热情地赞扬了《日下旧闻》的学术成就，这本书成为清代后期有关北京著作的范例。

对接下来的半个世纪而言，在简单或大部头的地方志里，北京继续得到着重描述。这座城市被写进康熙朝后期的《古今图书集成》里，标题的安排是通过引用更早文章来加以表现的。最详细的地图是顺天府地图，几乎没有显示北京城墙围绕的轮廓。此外，卷帙数以万计的宫廷出版物难以在公众中流传而且非常不便使用。^⑪ 同样笨拙的是经过扩充的《畿辅通志》，于 1735 年以相当规模的 120 卷刊行。然而到了雍正时期，北京往前看而非眷恋以往，而且 1735 年的地方志，类似于较简短的 1746 年《大清一统志》，强调了皇家的存在以及当时北京的向心性（centrality）。^⑫ 1739 年 250 卷的《八旗通志》是一部更加毫无掩饰的清代著作。

455

在这些 18 世纪 20 年代至 40 年代出版的著作中，北京开始以

⑧ 所有词条中约 75% 是寺院。

⑨ 1688 年比 1635 年有更多的寺院，但是并不是很多。

⑩ 每册是 25cm×17cm×9cm。

⑪ 《古今图书集成》，卷 10，7 页。

⑫ 关于皇城大殿和庭院的信息（以及寺院的简略列表）在《大清一统志》第 1 卷。

一种系统而详细的方式绘制地图。^⑬《八旗通志》包括了一幅内城的地图，绘制了详细的街道和胡同，并且在刊行的书上首次用图表显示了八旗驻防的界线。显然有 41 座寺院被当作这座城市的地标 (landmark)。虽然这幅地图对于辨认城市街道方向可能是有用的，但其目的是让八旗官方进行更好的控制。

一幅未标明日期的《京师全图》似乎利用《八旗通志》的地图作为范例得以绘制 (约 1744 年?)。显然，这幅地图不是一本刊行书籍的一部分，这也许是最早的京师地图之一。^⑭

456 在 18 世纪的上半期，在皇室成员的心中，制图是非常重要的。利用皇家作坊雇用的耶稣会士的测量技术，君主依靠新的详细地图开始显示和完成清朝对于整个京城的控制 (作为整个帝国)。^⑮ 第一幅似乎是一幅大的 (2.4m × 1.8m) 《皇城宫殿衙署图》，约 1723 年。^⑯ 这幅地图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幅北京地图，因为欧洲人关注的是各个部分之间的精确关系，以及地图信息的准确性和细节。宫殿的建筑、大量的皇城场地、湖泊的堤岸和岛屿、建筑和树木全部得到细心绘制。因为这是一幅皇家地图，不是为外来者而绘制的，建筑被标注但没有街道。当乾隆皇帝看到它时

^⑬ 国家祭坛的简图被收录于各种会典，陈列皇家范围的这些部分的参考书只给那些不论以何种方式参加典礼的同类高官阅读。(图 11-3 显示一幅类似这样的图解。)

^⑭ 1744 年地图 a，《京师全图》。有关年代，参见注 48。其尺寸 (约一平方米) 和缺乏有关皇城的细节意味着这是给官员或私人 (不是皇家或旗人) 使用的。1744 年地图 b，《京师城内首善全图》，在黄铭崇《18 世纪北京城市形态研究》第 11~12 页有展示并由他注明日期是 1744 年，属于相同的普通类型和形状。他们称为“大约 1744 年”，因为它没有显示雍和宫正式建造的那一年。我怀疑。

^⑮ 耶稣会士参加绘制了北京地区的地图 (在 1700 年洪水之后) 和全国地图 (在 1717 年)。《游记》，226~230 页。有关耶稣会士在清代地图绘制中的作用，参见哈利 (J. B. Harley)、大卫·伍德 (David Woodward) 所编《地图学史》第 2 卷第 2 册。《东亚和东南亚传统社会中地图》中余定国 (Cordell D. K. Yee) 的文章；欧立德、司马富 (Richard Smith)、劳拉·霍斯特拉 (Laura Hostetler) 未发表的论文；秦国经：《18 世纪西洋人在测绘清朝舆图中的活动与贡献》，载《清史研究》，1997 年第 1 期，37~44 页。

^⑯ 1723 年地图，《皇城宫殿衙署图》。黄铭崇《18 世纪北京城市形态研究》第 9 页中标注其日期为 1723 年；1940 年版的介绍称 1750 年地图为“雍正初期”。

必定感到高兴，因为在 1743 年，在另一幅皇室绘制的地图上显示了全城内水路和水井。^⑰

这些成果中达到顶点的成就是 1750 年内城巨幅地图的完成（14m×13m）。这幅地图的绘制特别认真细致，标明了主要街道、胡同、桥梁和城门，标注了 1 275 座寺院、38 座王府以及大部分政府衙门，粗略地绘制了每个建筑的形状。全部以彼此相关的精确比例显示。^⑱（如图 2-1 至 2-5 和 10-4 至 10-5 所示。）欧洲耶稣会士所带来的西方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这幅地图同样是为君主和八旗精英服务的：大部分汉族官员可能从未看到过它。

清代皇家资料的收集扩展到地图以外，形成了 18 世纪有关北京的图书。励宗万，京畿地区的当地人，在其 1721 年获得进士之后断断续续地服务于北京官僚机构，当他在工部任职时，承担了一个皇家委任的研究项目。他的 1745 年《京城古迹考》是为乾隆皇帝准备的。励宗万提供了北京 47 个地方简洁的描述（它们当中 32 座是寺院），从所知道的现有资料中首次概括，然后增加他自己有关当前位置的意见。这本实用的笔记可能是理想的指南手册，但是这本笔记仍然是手抄的，直到 20 世纪才可以在皇宫外看到。^⑲

与其他的项目一样，在 1742 年到 1769 年之间编辑的《国朝宫史》是皇家对记载北京历史和现在辉煌感兴趣的证明。36 卷记载

^⑰ 黄铭崇：《18 世纪北京城市形态研究》，9、136~137 页。

^⑱ 1750 年地图，《清内务府藏京城全图》。原件（1：650）存于北京，但据我们所知是两个缩减尺寸的版本。我感谢艾龙（Elling O. Eide）给我提供他的 1：2 600 版本的复制品（用于我的插图）。参见黄铭崇：《18 世纪北京城市形态研究》，6~13 页；杨乃济：《〈乾隆京城全图〉考略》，载《故宫博物院院刊》，1984 年第 3 期，8~24 页；以及三个版本的介绍。有关寺院的数量，参见索引有关日本版第 11~26 页，是我统计的。

^⑲ 励宗万：《京城古迹考》，编者的前言；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490~491 页；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 68 册，150 页。有关 1745 年的日期，《北京历史纪年》编写组：《北京历史纪年》，213 页。《日下旧闻考》的编者看到了这份手稿，但是 19 世纪 80 年代《顺天府志》的编者没有看到。在第八章中讨论过，励宗万使用了许多明代资料，还有《春明梦余录》和《日下旧闻》。